

中图分类号: K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0)02-0131-(06)

俞秀松与上海工人运动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早年的工人运动生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的一个缩影。他投身工人运动是他自己追求真理的具体表现。俞秀松在上海领导党团工作时参加了一些工会组织,进行指导,又内部指挥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多次工人罢工斗争。他对帮会流氓应对有方;对帮会的见解一分为二,富有策略性。他提出的组建工人俱乐部的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工运路径。在他的言行中体现了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和改造世界的宏伟抱负。这种精神与抱负在一定程度上又具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上海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俞秀松; 中国共产党; 上海工人运动; 俱乐部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早年的工人运动生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最初结合的一个缩影,很值得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罕见,以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为例,其中根本不提俞秀松。在众多的五卅运动的论著中亦鲜有提及俞秀松的。本文主要根据新发现的共产国际有关俞秀松的档案材料,回顾俞秀松在上海进行工人运动的史实,并对其日记进行解读,以期了解他投身工运的心路历程。

—

俞秀松 1899年出生于浙江一个农民的家庭。

他在自传中说:“父亲在清朝时曾得到过很高的学术称号……他对我少年时期的影响很大。我九岁到十六岁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当时我曾充满英雄主义的幻想。我二十岁(1919)那年,亲眼目睹了五一节游行。这件事大大改变了我的思想情绪,于是中断了学业,开始参加社会运动。”^{[1](P228)}

1919年俞秀松在新学说的影响下,“再也不想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我现在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于是离开家庭,在同学的帮助下,去了北京,参加了一个名叫工读互助团的组织。“一面以劳动为生,一面自学”,经过半年的实践,俞秀松逐渐明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通过革命来建立人类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种空想,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要建立人类社会的新生活,首先要唤起工人大众,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宣传”。^{[1](P230)}

抱着这种信念,俞秀松在1920年3月27日

收稿日期: 2009-10-1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SJ0703)

作者简介: 邵 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从北京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4月上旬他“离开《星期评论》社……改名换服”,^{[1](P158)}“进了一家铁厂,在那里工作了四、五个月”。“目的是为了在工人之间进行宣传,并组织了一系列工会。”^{[1](P370)}“在那时我开始参加了工人运动。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1](P230)}这次纪念会议是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空地上进行的,实际与会的有各业工人和各界来宾数百人。^{[2](P12)}

1920年5月俞秀松参加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于临时书记陈独秀负责在除上海以外的四个大城市成立党的组织,俞秀松“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8月22日俞秀松根据党的委派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书记。他还组织了“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了一些工会组织(如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俞秀松“还担任了《劳动界》(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等刊物的编辑”。^{[7](P231)}《劳动界》周刊从1920年8月创办到1921年1月停刊,共出了24册,它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它在当时的工人启蒙刊物中“发行范围最广、说理最显豁、收效最宏大”。^{[3](P87)}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集中精力开展工人运动与组织工会。1920年12月《劳动界》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劳动者以后最要急先进行的事,就是努力组织真正的团体,为我们将来做事的后盾。”^[4]在此之前,有俞秀松做过工作的上海厚生铁工厂等单位联合组建的“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年11月成立,会员有370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指导下组织的第一个工会。12月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俞秀松在苏俄填表时称,1920年他“在上海曾任工会教导员”。^{[1](P370)}

“上海……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工人仅50万,其中主要是纺织工人,就业于86家纺织厂。……工厂的管理者与工人组织的关系采用(欧洲)大陆的办法。这些管理者享有不小的特权。他们压迫工人,榨取其血汗。工人平均

每天的工作时间达11小时。在上海的某些工厂,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9或10小时。工资各不相同。在工厂工作不满3年的学徒是不发给工资的。”^{[1](P205)}俞秀松自称1920年在上海参加纺织工会等,^{[1](P370)}此说在时间上有误,沪西纺织工会是1921年春才开始筹建的。^{[3](P76)}

1921年2月上海有轨电车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次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当时两个电车工人对青年团员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至今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无法开展斗争。因此,他们用停工[译注:封闭工厂(车辆)]的办法来与我们作对,然而我们是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继续停工,我们将得到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的支持,我们将使这个城市没有光,没有水。”俞秀松等人据此认为“这些工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且了解资本家的伎俩”。^{[1](P208)}

这年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包惠僧负责。8月,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小沙渡叉袋角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也因人力和经费所限,工作没有开展起来”。^[5]

在中共开展工人运动之初,帮会势力是个很大的阻力。^①有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把全上海数十万工友“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青帮、洪帮从中作祟,各有老头子,各分码头,各呈各的势力,争地盘,排除异己,常常有工友与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6]陈望道回忆说,“那时上海流氓很多、很凶,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我们要做工会工作,一定要应付这批人”,而“俞秀松主要负责应付流氓,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7](P24)}正是有了与帮会流氓周旋的切身体验,因此俞秀松对帮会组织的看法就比较全面,实事求是。1921年春,俞秀松等人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在中国,有特殊的组织保护工人的利益。最强的是红帮(red groups)和青帮(blue groups)。这些组织团结了一般的苦力,特别是在工厂中。在Yan-Tsi-Nian三省,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现在已达300~400万。这些组织强大但不合法。这些成员按照其身份分成不同的等级。老头子是第一级,其次是Siaz-To-Ze等等。老头子和Siaz-To-Ze

有他们的下属,其等级由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来决定。他们的规矩和仪式非常严格。较低等级的人必须向其上级下跪来表示顺从。如果成员违反了重要的帮规,可以将其处死。在另一方面,这个组织保护每一个成员,如同已经表明的那样,例如,迫害和杀害非成员,因为这些非成员在专门由这些组织的成员受雇的企业里接受了工作。这两个帮会不仅在劳工中享有声望,而且它们也保护小偷和其他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在上海有中央机关,在那里的便衣警察 (agentsofthepolice) 和外国人已得到许可,他们的主要职责看来是负责监视这些组织的阴暗面。这些代理人和外国人为了‘接触’而参加这些组织。甚至第一次革命从后者得到很多援助。它们也帮助最近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大组织之上,有许多当地和农村的劳动组织。例如,在上海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宁波帮、广州帮、江北帮 (kin-bei-bon)、苏帮 (Subon)、Chayu帮、苦难 (力) 帮 (Khu-nan-bon), 等等。这些帮会纯粹是按地域的原则来组织的。它们为了工作而互相竞争。这种狭隘的地域原则在这些组织中引起很大的冲突。要在这些劳动组织中废止这些倾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有必要向它们发动一场坚决的斗争。”^{[1] (P206~207)} 俞秀松等人对帮会的分析是一分为二、很有见地的,同时较好地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统一。有俞秀松做过工作的上海厚生铁工厂等单位参加的“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人“希望我们这个工会,不和资本家握手,不和政客、流氓握手,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8] (P277)} 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也同意吸收在帮的工人参加。

1921年3月,俞秀松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等人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论及中国新的劳动组织时说:“它们已在过去的一年里建立起来。这些新组织具有一个更现代的特点:例如,上海机械工人职业工会、印刷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有轨电车工人工会 Chau-Shan (潮汕) 工人总工会。这些工会的存在还不足一年,它们的成员数量正在持续增长。它们中有不少组织正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两次大罢工以后,这两次大罢工是由1920年的经济情况引起的,它们唤醒了工人们要团结和组织起来的觉悟。这些行业工会与我们的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有着密切

的联系,其中也包含我党在工厂工作的党员。有些工会已开办工人学校,它们也出版日报和组织工人俱乐部。学校和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包括工会会员,一般地说,还包括所有的工人。在上海,这些工会每个星期天都邀请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朗读有关下列内容的讲稿:关于世界劳工运动,以及欧洲国家工人的斗争方法和组织体制。这些工会的成员已组织了武装小组,它们做好准备在罢工期间用武力来对付警察和罢工的破坏者。这次学生运动,最初纯属知识阶层的运动,现在正逐渐试图与劳工运动结合在一起。……总之,有必要补充一句:中国劳工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去年,在全中国进行了40次罢工,其中大部分是要求增加工资而发起的,2次罢工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只有1次是政治性的罢工。”^{[1] (P208)}

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3个月。1921年底,他又参加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1922年初回国,再次在上海工作,“积极参加纺织工人和五金工人的罢工运动”,并受共产党指派,参加了国民党。5月俞秀松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2] (P39)}

1922年4、5月浦东日华纱厂工人进行了第一、二次罢工。^{[2] (P46)} 5月24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号召大家“密切地联系起来,互相帮助,以与资本家作斗争”。^[9] 根据柯庆施回忆,1922年“很多学生参加了团,工厂也有了团的活动。五金、估衣、邮工等方面当时有团员二三十人,还搞过一次邮差罢工”。^② 日华纱厂在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时,团曾帮助募捐1000多元。我们都跑到马路上募捐。募到钱就发给一个小徽章(徽章上的字已记不得了)。另外,我们还曾到浦东发过传单。大家并排在街上走,见人就发,连警察也看我们的传单,可是他们念过共产党的传单还不知其所以然。有一叫孙良惠的工人,另一纱厂工人,他们都帮助发过传单”。^{[1] (P38)}

1922年10月,俞秀松“内部指挥”上海金银业800余工人发起罢工,^{[1] (P344)} 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加薪、减少学徒年限等。罢工坚持了27天,在经济上取得了部分的胜利。^{[2] (P45)}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在新选委员的分工中没有提及俞秀松。^{[2](P52)}

二

1924年 1月,俞秀松参加了党的四大。同年俞秀松曾经到杭州进行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秋天回沪。当时上海只有四五个党小组,而在工人区的一个也没有。但到了 11月,党小组已发展到 8个,其中有 4个为工人小组。到 1925年 5月,在上海区委直接领导下,有“杨树浦、引翔港、小沙渡、浦东、曹家渡等五个工业区的支联干事会 15个支部”。^{[3](P198)}正如俞秀松所说:“在上海我工作了将近一年,任我党上海地方区委(内有许多工人支部)书记,上海党中央下属的军委主席。”

1924年 12月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俞秀松任成立宣言起草委员,并在会上就宣言 16项内容做了说明,其中有“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的内容。大会选举俞秀松等 21人为委员。^{[2](P70)}

1925年 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开除男工,愤而举行罢工。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组织专门的罢工委员会,发动了 3.5万工人的大罢工。2月 12日俞秀松担任委员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议决“由两促成会召集各团体开联合会,组织后援会”。俞秀松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此后本会各团体更能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奋斗,必达根本消灭之目的。”^[10]

2月 15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四十余团体 90余人开联席会议,议决成立“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被当选为后援会 9个执行委员之一。^[11]

2月 19日上午各团体组织之工人后援会开委员会,俞秀松等出席,通过了“我国同胞亦应一致为工人后援”等议案。^[12]

2月 21日俞秀松等 3人前往警察厅谈判,表达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的意见:“一、此次罢工,纯由工人自动,本会起而援助,实本于民族及博爱之精神。工人是否有轨外行动,无从担保,惟极愿劝导工人力守秩序。二、被捕工人,皆因公受累,且为贫苦之民,故愿警方早日开释,以平工人之气,使工潮易于解决。三、现在工人条件

已一再让步,惟日本资本家毫无诚心,故愿上海各界能起而警告日资本家,尤愿警厅负保民卫国之责,对工人公平待遇,对日人万勿示弱。”^[3]

2月 24日下午 2时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开委员会,“到者向警予、张人权等十余人,钟森荣主席,先由俞秀松报告:(一)募捐三日之情形;(二)与警厅两度接洽之情形;(三)工人方面之现状。次即由主席提出各项议案,经众议决(一)派代表接洽联络出任调停之各团体,使趋一致;(二)派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及溥益纱厂接洽,请求援助;(三)应内外棉厂工会之请求,派代表前往演讲,劝其坚固组织,严守秩序;(四)向有力各团体募款;(五)设法救济被捕工人,以缓和工人方面之空气。当即分别推定代表,分头进行。五时许散会。”^[4]

二月罢工“是日资纺织势力侵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大规模罢工的打击”,^{[3](P187)}初步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

5月 15日,日本资方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19日中共上海地委和共青团上海地委召集宣传联席会议,研究宣传示威计划。根据会议决议,“国民党区党部召集联席会议,由俞秀松总指挥”。^{[2](P77)}俞秀松任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的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P343)}他积极发动国民党党员参加公祭顾正红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革命活动,为五卅运动的胜利忘我地工作。1925年 11月 24日俞秀松在旅莫斯科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表上说:“在上海内部指挥五卅事件”、“在上海内部指挥日本纱厂罢工运动,并公开向社会各方运动援助日本纱厂罢工运动”,^{[1](P344)}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当然也是俞秀松个人历史上的光荣一页。同年 10月俞秀松受党指派带领一批优秀青年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三

在俞秀松的日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进上海工厂工作的认识。

1. 不满工厂的现状:“现在上海的工厂,据我所晓得的,没有一处不比家庭学校……更黑暗。”^{[1](P144)}“现在工人的知识和思想太薄弱了……工人的旧观念——迷信的,阶级的——和旧

习惯——不知卫生——实在中得太深了,现在我们进工厂去,对他们说什么资本家,什么罢工运动……等,他们是一点不知道的……我们的位置,早被厂主夺去了。”^{[1](P117)}

2. 卫生状况极差: 俞秀松“只觉到工厂里这样的不清洁,我们所吃的饭或菜里,常常见蚊子苍蝇,我实在讨厌了!”而俞秀松自称“清洁整齐”是“已养成不可改了”的习惯之一。

3. 交通不便: “从工厂——厚生铁厂,在虹口东鸭绿路三百五十一号半——到《星期评论》社,都是走的,很快的速度,要走一点钟才到呢。”^{[1](P144)}从东鸭绿路到法界白尔路三益里沈玄庐住所“要走一个多钟的路,我从厂出门的时候,是六点半,到了三益里十七号,已七点多了。”^{[1](P122)}

4. 因而心理不愿意: “我现在知识欲又一天一天地奋发起来,以为我现在工厂的情形,真没有什么意思,徒受无为的苦痛罢!我想:我将来还是在教育上尽我的力去鼓吹,一方面再学些农业知识,每天做几小时的农作——如园艺。工厂生活,我实在很不愿意过的,不过仗着感情的冲动,中国的工人太苦痛了,一般人又看得劳动界太微贱,知识界里的人又不肯与工人为伍。那么我去试试罢,并非我的本愿。”“于是心里又起了大冲突。一方面想学问无穷的,求伊做什么;况且观察社会状况何尝不是学问吗?一方面想我的学问终究不足,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有什么能力好来解决?这两方的思想战得很利害了,还要从横堵里生出别的问题来了!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来干社会事业。但是我要学习求知识的工具,第一是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倘然在上海厚生铁厂做二小时劳工,读四五小时外国文(仲九替我的办法),我看该厂有些不愿意的,我于不愿意中去讨生活,也有些不愿意,而且我在该厂住了三月,自己也觉得很惭愧,不如再求几年学。在我的年龄期,所以到厚生铁厂去做工,一方面有这几种原因,而他方面说来,工厂生活,于我的习性和生理都很不相宜的。……我从今年过了我的婚期以后,对于这事已战了几次战争了。”^{[1](P151)}

不过,俞秀松毕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坚强的党性,他非常清楚开展工人运动对党的极端重要性,愿意

为此作出个人牺牲。他在日记中写到自己进工厂的目的:“并非去做苦工,这种一天十几点的牛马劳动,我是很恶的,所以我对于专门研究科学的和发明家,非但不反对的,而且认他们的工作是很有益于社会的。我进工厂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的内容和工人的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的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的能力,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我这二月所得的经验,对于劳动运动——工界方面——的着手办法,只有两个:(1)我们提倡劳动运动的人,抛弃他所有一切的事务,先进工厂去做苦工,预备情愿吃几年苦痛,忍做几年马牛生活,惟工厂里的命令是听,拼命努力地学习工作技能,总要学得很精很熟,可以进什么工厂里做个工头,而且要各厂主争聘不得的。在这个时期,到工厂去当工头或大司务,就可利用现在工人的弱点——旧观念——出来替他们组织什么团体,一定很有力量的。我们的同志,如有这样十人,在上海做事,那么成绩定有可观的了。(2)我们提倡劳动运动的人,在上海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部里设备各种东西,如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等,我们只要认识了几个工人,就可叫他们辗转相介绍人来这个俱乐部,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施一种工人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给他们一种新知识,渐渐地鼓吹起来,然后再组织各种的团体,来实现我们的劳动运动。”^{[1](P117~118)}其中第二个办法我们姑且称之为“俞秀松模式”。俞秀松参与编辑的《劳动界》在1921年1月16日出版的第23期上发表《发起劳工俱乐部的商榷》的“来件”,其中还有“劳工俱乐部简则”。1920年12月19日上海第一个工人俱乐部——上海工人游艺会正式成立,拥有会员400余人。^[4]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俞秀松等人到成立会上发表演说。^{[2](P45)}1924年8月又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事实证明“俞秀松模式”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工人运动模式。

俞秀松的精神世界是积极向上的,他有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与奉献精神,这是他搞好工人运动的内在动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前是抱利己主义——独善其身——的人,从去年起,才把我的狭义的利己主义变为广义的利己主义;但是利他主义,我总不敢相信。……我们现在要觉悟,

我们活在社会上,决不是我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单独生活的。我要利己,同时不能不利他;利他就为利己。我现在的思想,根本是出发于此,所以我虽主张人生是快乐,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独享这种快乐,暂时不能不牺牲我的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1](P118-119)]

综上所述,俞秀松投身工人运动,并非出于他个人的冲动,而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追求真理的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行中体现了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和改造世界的宏伟抱负。这种精神与抱负在一定程度上又具体体现了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上海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关于帮会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可参见拙作:《近代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②《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第36页记载,邮差罢工发生在1922年4月。

- ③《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俞秀松纪念文集》第449页作20日,误。
- ④《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俞秀松纪念文集》第449页作25日,误。

参考文献:

- [1] 俞秀松纪念文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 [2]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Z].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 [3]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 [4] 1920年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J].劳动界,第22期.
- [5]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J].百科知识,1979(2).
- [6] 启汉.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J].劳动周刊,第14号.
- [7]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8] 中国工运史料第1至8期汇编(上)[Z].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 [9] 先驱·第8号,1922-05-15.
- [10] 民国日报,1925-02-13.
- [11] 民国日报,1925-02-16.
- [12] 民国日报,1925-02-20.

Yu Xiusong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ghai

SHAO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Yu Xiusong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ist Youth League. His early career involved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was an epitome of the initi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intellectuals with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By throwing himself into the workers' movement, he manifested his own pursuit of truth. When he took charge of the Party's work and the Youth League's work in Shanghai, Yu Xiusong joined some trade unions and guided them; in addition, he organized and launched a number of workers' strikes, including the May 30th Movement (1925). He had practical ways to cope with rogue gangs and his views on secret societies were dialectical and strategic. His proposal that workers' clubs be set up w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workers' movement which wa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His words and deeds reflected the proletariat's valuabl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its lofty aspiration to transform the world.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spirit and ambition were manifested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is spirit and ambition exerted a hug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ghai.

Key words Yu Xiuso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ghai; clubs

(责任编辑:申浩)